

自生能力、交易环境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

——基于四川省 32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侯佳君 曾以宁 刘云强¹

【摘要】 本文基于对四川省 32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从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衡量合作社绩效水平，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生能力、交易环境和其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外部交易环境中，合作社对外依托包括外部社会资本和政府参与都会间接地减少合作社绩效；而加强合作社在理事长能力、财务信息透明度、技术教育、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优势，能够显著增强合作社的自生能力，促进绩效水平提高。此外，有些因素例如股权集中程度、普通社员影响力、产品竞争能力不能构成合作社自生能力的积极来源，甚至阻碍合作社的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 合作社绩效 自生能力 交易环境 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0)-11-0113(08)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它将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农产品供应链以应对现代市场的产品标准、交易特征以及日益激烈的竞争。^[1]据农业部经管总站体系与信息处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 217.3 万家，是 2012 年的 3.15 倍，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9.1%。¹然而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停留在较低的发展层次，合作社的潜在问题日益凸显。总体绩效不高为主要问题之一，具体体现在：未能发挥潜在组织能力、创收能力较差、发展潜力较弱、市场竞争力与社会影响力不强等。^[2]

合作社绩效是组织内外部情况的价值表现，其产生与发展也往往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合作社内部特征是反映其自生能力的主要因素，目前学者们主要考察了组织成员、内部监督、^[3]分配机制等内部因素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4]其次，考虑到合作社的产生并非分散小农自发，而是在一系列外在力量下共同促成，学者们通过归纳制度结构、依托组织、^[5]产业链环节、^[6]市场容量、^[7]外部支持以及政府作用^[8]等外部因素与绩效的关系，来体现外部环境在影响合作社绩效水平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内外因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提升自生能力才是保持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根源。尽管目前对于合作社绩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但遗憾的是，一方面，目前针对合作社自生能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较少，学术界对于合作社绩效的决定因素，以及在演化进程中外部因素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等问题还存在不同见解。另一方面，关于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有序 Logit 模型，这些方法无法区分并且评估各影响因素的直接、间接和总效果，而结构方程模型（SEM）能容许更加复杂的模型，没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允许测量误差的存在，具有独特的优势。^[9]

¹**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农业小型基础设施集体管护研究”（编号：18YJA6301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复杂系统下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承载力测度及优化路径研究”（编号：15YJC630081）的研究成果；四川省教育厅“资源约束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创新团队（编号：18TD0009）。

作者简介：侯佳君 硕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曾以宁 硕士研究生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刘云强 副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利用调研第一手资料来确认假设的潜在变量间的可能关系，揭示内外因作用轨迹，对现有形势下合作社绩效的生成根源进行分析，发现组织内外部的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提供科学、合理的可行性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以“状态—结构—行为—绩效”（SSCP）范式为逻辑主线，探索合作社的绩效生成路径：在客观外部环境下，绩效产生于合作社内部运作的过程，终于组织运行的结果（见图1）。

根据自生能力（Viability）理论可推知，^[10]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如果一家正常管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需要政府任何特殊的外部扶持，就能获取广大社员可接受的合理利润，那么这家合作社就具有自生能力。目前学界针对合作社自生能力的研究较少，合作社的自生能力主要被归因于合作精神、组织能力和内部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11]本文从治理制度和再生能力两个维度评价合作社自生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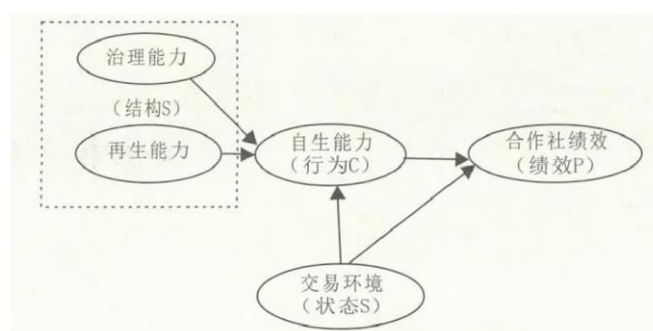


图1 自生能力、交易环境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关系图

合作社是一种农村组织创新形式，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其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对合作社绩效有积极影响。^[12]其中，股权集中制度、民主决策机制和内部监督是合作社治理的主要内容。同时，作为组织领导人，理事长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能人”，扮演协调成员行为的角色，掌握着稀缺性的资本、技术与社会资源等关键要素，对合作社经营诸多方面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其战略眼光与经营管理能力对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13]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₁：理事长知识和经验越丰富，合作社自生能力和绩效水平越高；

H₂：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带来合作社自生能力和绩效的提高；

H₃：提高普通成员对合作社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能力，会增加合作社自生能力和绩效水平；

H₄：加强内部监督力度对合作社自生能力和绩效水平也有正向影响。

再生能力是指合作社能为农户带来的更好效益，在市场中有持续发展趋势，目前有学者用注册资金额、基地和加工企业建设来衡量发展潜力。^[14]由于合作社性质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合作社再生能力体现在技术教育、创新产出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合作社以提供技术服务直接推广生产技术和新品种，促进社员增产增收；另一方面，作为农村环保的重要力量，合作社

应当积极促进当地绿色生态循环农业。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₅：技术教育功能的实现，会提高合作社再生能力和绩效水平。

H₆：产品竞争力与创新产出能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强，对合作社再生能力和绩效促进作用越大。

H₇：合作社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提高资源的再生能力，对绩效有积极作用。

交易环境是合作社从事各种活动直接或间接涉及的社会关系总和。合作社是一种基于资本和政府支持的特殊组织，比其他组织都更依赖外部环境，^[16]是影响合作社发展和成员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变量，^[16]在满足社员和组织利益、^[17]减少运营费用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同时，在政府扶持下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增加，经营风险降低，竞争力提高，即政府的特殊支持能确保合作社在市场竞争中成为平等主体。^[19]本文提出最后假设：

H₈：对外依托经济实体和联合社，核心社员在政府任职，掌握较多的外部社会资本，都对合作社绩效有积极影响。

H₉：政府支持对合作社绩效有正向作用，政府干预对合作社绩效有负面影响。

H₁₀：交易环境将直接对合作社绩效产生影响，而合作社能通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最终提高自生能力和组织绩效。

三、变量度量和模型选择

1. 绩效水平的度量

根据合作社多元属性及实际情况，结合有关专家、理事长及核心成员意见，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置五级回答选项，选取“经营状况”、“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全面考察合作社的经营状态、业务增长与利润状况；以“统一销售产品的比例”来综合体现管理效益；社会效益从“社员收益”和“社员满意度”展开，主要衡量合作社增收能力和社员参与满意度（见表1）。

表 1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变量的定义

因变量	定义
经营状况 Y1	经营非常困难、濒临解散=1；经营困难、基本无 盈余=2；经营状况一般、收支平衡=3；经营状况 良好、略有盈余=4；经营状况非常好、效益明显 =5
成长能力 Y2	远低于两年前=1；略低于两年前=2；基本持平=3； 略高于两年前=4；远超于两年前=5

盈利能力 Y3	远低于同类竞争者=1；略低于同类竞争者=2；基本持平=3；略高于同类竞争者=4；远超于同类竞争者=5
统一销售产品的比例 Y4	0%~20%=1；21%~40%=2；41%~60%=3；61%~80%=4；81%~100%=5
社员收益 Y5	在当地从事同类产品生产人员中，社员的人均年纯收入与非社员相比：远低于非社员=1；略低于非社员=2；基本持平=3；略高于非社员=4；远超过非社员=5
社员满意度 Y6	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

2. 自生能力与交易环境的度量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选取十六个三级变量对自生能力与交易环境进行综合衡量。首先，用合作社自身利润率 r 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 r' 的差距作为评价指标，将自生能力 x_1 划分为五个等级， r' 固定为 10%。当 $r-r' \leq -10\%$ ，赋值为 0； $-10\% < r-r' \leq 0$ 时，赋值为 1； $0 < r-r' \leq 10\%$ 时，赋值为 2； $10\% < r-r' \leq 20\%$ 时，赋值为 3；最后 $r-r' > 20\%$ 时，赋值为 4。合作社理事长才能由管理经验 (x_2) 和最高教育程度 (x_3) 两个变量来反映， x_2 可划分为毫无经验=1，经验较少=2，一般=3，经验较多=4，经验丰富=5，而 x_3 赋值情况为文盲=1，小学=2，中学=3，大专=4，大学及以上=5。治理制度从股权结构、决策机制、内部监督制度三个方面考虑。股权结构由股权集中制度 (x_4) 反映，股权集中程度是衡量合作社的股权分布状态的主要指标，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赋值为 0%~20%=1，21%~40%=2，41%~60%=3，61%~80%=4，81%~100%=5。普通成员对合作社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能力 (x_5) 是决策机制的体现，等级划分为很弱=1，比较弱=2，一般=3，比较强=4，很强=5。内部监督制度从监事会召开次数 (x_6) 和合作社财务信息公开的次数 (x_7) 两个方面体现，赋值情况为零次=1，一至五次=2，六至十次=3，十一至十五次=4，十六次以上=5。

本文用再生能力来表示合作社的发展潜力，以提供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次数 (x_8) 来反映合作社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零次=1，一至五次=2，六至十次=3，十一至十五次=4，十六次以上=5。而产品竞争能力由推广农业新品种数量 (x_9) 来表示，无=1，一至三个=2，四至六个=3，六至八个=4，八个以上=5。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环保型农药与化肥占有所有工业投入品的比例 (x_{10})、平均每亩耗水量减少比例 (x_{11})、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率 (x_{12})，这些指标都体现了合作社生产过程中对环境与资源利用的重视程度，等级划分为 0%~20%=1，21%~40%=2，41%~60%=3，61%~80%=4，81%~100%=5。

最后，本文选取外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制度环境来反映合作社的交易环境。对外依托实体和联合其他合作社的效果 (x_{13}) 和核心社员在政府部门任职人数 (x_{14}) 两个变量来体现外部社会资本，这两者从不同角度展现合作社在社会结构所处位置。其中 x_{13} 等级划分为无=1，有但效果不大=2，效果一般=3，效果较大=4，效果很大=5，而 x_{14} 等级划分为无=1，一至五人=2，五至十人=3，十人至十五人=4，十五人以上=5。而外部制度环境则由政府支持力度 (x_{15}) 和政府干预程度 (x_{16}) 来衡量， x_{15} 划分为无=1，一至五人=2，五至十人=3，十人至十五人=4，十五人以上=5，而 x_{16} 划分为完全不干预=1，基本不干预=2，较少干预=3，较多干预=4，过分干预=5。

3. 计量模型选择

由于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潜变量，因此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多变量统计分析，检验模型中的显变量、潜变量和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一般包括三个矩阵方程式：

$$E[\eta] = B\eta + \tau\xi + \zeta \quad (1)$$

$$x = \lambda_x \xi + \delta \quad (2)$$

$$y = \lambda_y \eta + \epsilon \quad (3)$$

(1) 式中，E 为潜变量的期望值， η 为内生潜变量， ξ 为外生潜变量，B 为路径系数，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τ 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系数矩阵， ζ 是残差项， $E[\zeta]=0$ 。

测量模型则是测量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关系的方程，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潜变量 ξ 的测量，另一种是内生潜变量 η 的测量。

(2) 式中，x 表示外生显变量向量组合， λ_x 为外生观测变量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阵；(3) 式中，y 表示内生显变量向量组合， λ_y 为内生观测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δ 、 ϵ 是测量误差， $E[\delta]=E[\epsilon]=0$ 。

四、样本分析

1. 问卷设计及样本说明

本文选定四川省成都市、绵阳市、雅安市、泸州市、自贡市、广安市、达州市、德阳市和眉山市 9 个地市，对 321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在每个调查点的合作社名录中随机抽取 40 个合作社作为调查对象，发放 360 份调查问卷，每个合作社由其理事长填写 1 份合作社调查问卷，问卷有效率达 89.17%。

2. 数据统计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四川省合作社绩效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发展不平衡（标准差均在 1.039 以上）。合作社自生能力总体情况较好，但差异较大（均值为 2.32，标准差为 1.367）。理事长才能也有较大差别（标准差分别为 1.350 和 1.265），其管理经验较丰富（均值为 4.26），教育水平主要为中学和大专学历（均值为 3.84）。合作社股权不集中，决策机制民主程度较高，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普遍较低（均值为 1.70，标准差为 0.877），普通成员对合作社重大事项决策影响力较高（均值为 3.57，标准差为 1.257）。内部监督力度较大，监事会召开和财务信息公开次数较多（均值分别为 3.53 和 3.67），但发展不平衡（标准差为 1.158 和 1.146）。技术教育水平较高，提供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次数较多（均值为 3.8，标准差为 0.997）。产品竞争力与创新产出能力较强，推广农业新品种数较多（均值为 3.06），但标准差为 1.116 表明不同合作社推广新品种的情况差距大。合作社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情况也存在差异（均值为 3.07、3.06 和 3.44，标准差为 1.180、1.239 和 1.305）。目前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的组织主要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其他供销企业，调研合作社中有依托的实体或为联合社成员大约占到一半的比例（均值为 2.81，标准差为 0.837）。核心成员在政府任职的人数较多（均值为 2.96），说明合作社与政府关系密切，但核心成员结构也有差异（标准差 1.248）。政府的支持力度较强（均值为 3.6），但政府干预程度不高（均值为 2.19），且具有选择性与差异性（标准差分别为 1.354 和 1.071）。

3. 问卷检验和因子分析

为了判断问卷题目的内在信度和效度，本文选取 Cronbach' s α 值和因子分析法。

(1) 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通过 SPSS22.0 软件运算，本文问卷的 Cronbach' s α 值为 0.943，大于一般标准 0.7，说明问卷项目的内部一致性较好，为高信度。其次，测量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通常用因子分析的载荷值来判断，本文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5，问卷的收敛效度较好，因子之间的区别效度也越高。

(2) 因子分析。基于样本数据，本文通过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首先，本文设置了 16 个自变量作为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只有 KMO 值大于 0.5，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经测算分析，本文将变量 x_3 删除，才使得因子的负荷符合假设，并运算得 KMO 值为 0.886,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为 3305.4，也达到了检验水平 ($P=0.0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 4 个公共因子对 16 个指标的累计贡献率为 75.3%，几乎包括了量表的绝大部分信息。

其次，对 6 项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 KMO 值为 0.84,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为 1138.4，达到显著性水平 ($P=0.00$)，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数量为 1，累计贡献率为 63.9%，表明这个因子对 6 个测量指标解释程度为 63.9%。

五、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 模型适配度检验。本文运用 AMOS17.0 软件对初始模型（图 1）进行检验，对假说和路径进行验证。本文运用 6 项检验指标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见表 2）。通过对基础模型的拟合，本文决定将 x_{14} 从“交易环境”中析出，从表 2 可知，最后模型指标都已达到基本参考标准，拟合度较好，由此确定最佳模型。

表 2 模型拟合效果

检验指标	CMIN/DF	GFI	AGFI	CFI	IFI	RMSEA
初始模型指标	4.232	0.864	0.897	0.811	0.853	0.095
修正模型指标	1.248	0.914	0.922	0.901	0.925	0.03
判断	<3.0	>0.9	>0.9	>0.9	>0.9	<0.05
标准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路径	实际方向	显著性水平	总效应
治理能力→自生能力	+	***	0.313
再生能力→自生能力	+	***	0.591
自生能力→绩效	+	***	1.279

交易环境→自生能力	-	***	0.743
交易环境→绩效	-	0.252	0.434
X1→自生能力	+	***	0.302
X2→治理能力	+	***	0.746
X4→治理能力	-	**	0.874
X5→治理能力	-	*	0.793
X6→治理能力	+	0.117	0.747
X7→治理能力	+	***	0.644
X8→再生能力	+	***	0.560
X9→再生能力	+	0.154	0.808
X10→再生能力	+	***	0.873
X11→再生能力	+	**	0.825
X12→再生能力	+	***	0.909
X13→交易环境	+	**	0.575
X15→交易环境	+	***	0.91
X16→交易环境	+	*	0.4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2) 计算结果。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自生能力、交易环境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自生能力对合作社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为正，效果排序为：再生能力>治理能力。而交易环境对合作社的绩效影响为负且主要为间接效应，效果排序为政府干预>对外依托>政府支持。

2. 结果分析

(1) 理事长才能对绩效有正向影响，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对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假设一成立。理事长管理经验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理事长才能可以促进合作社绩效的提高。假设二不成立，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合作社绩效在 5%水平负相关。这表明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合作社的绩效越低。原因是股权集中制度虽有助于增强管理层的组织控制力，提高决策质量，但经济地位悬殊也会阻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导致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以及社员心理不认同等诸多问题。

(2) 普通社员对重大事务的影响力与绩效呈负相关，内部监督制度对绩效有积极影响。假设三不成立，假设四成立。财务

信息公开次数和绩效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符合预期。但是监事会召开次数对绩效影响不显著，普通成员对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能力与绩效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大多数四川省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大多数民主管理规定流于形式，因此决策机制可能发挥相反作用。其次，合作社社员多为小农户，受限于知识水平，以自身短期经济收益为重，社员的异质性增强严重影响了决策效率与执行。

(3) 技术教育、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与绩效正相关，而产品竞争力对绩效影响不大。假设五成立，假设六不成立。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对绩效的影响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然而推广农业新品种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都不显著。这是因为调研的合作社主要为种植合作社，受自然环境影响和技术支持条件约束，产品品种相差不大。其次，调查中只有 86 家合作社具有精加工环节，其余合作社仍处于粗加工环节，即分级、包装后直接销售，产品品种也未能在深加工环节实现多样化。假设七成立。“环保型农药与化肥占有所有工业投入品的比例”、“平均每亩耗水量减少比例”以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有效灌溉面积的比率”对合作社绩效的参数估计值都为正，且分别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这符合现实预期。

(4) 交易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有间接的负面影响。从整体来看，交易环境对自生能力的消极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但对绩效的直接消极作用不显著。本文认为交易环境对于组织来说是外生给定的，合作社不能控制，将直接对合作社效益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是次要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合作社可以通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调整制度结构，最终影响组织绩效。结果显示在目前的交易环境下，四川省合作社不能更好地通过自身经营产生利润。

同时，依托组织实体和联合合作社的消极影响亦在 5%的水平上显著，假设 8 不成立。原因在于依托外部组织在四川省合作社深入发展时期并不明显，即使外部依托组织对合作社成员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但对具体每家合作社的经营和盈利状况、环保投入比例、耗水减少和节水灌溉影响也不大。假设 9 不成立。政府干预程度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干预力度越大，绩效越低，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往往具有时间滞后的性质，会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束缚。政府支持力度的负面影响也在 10%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四川省合作社政府扶持政策并非普惠性，往往增加合作社投机心理和寻租行为，最终导致资源浪费。

六、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自生能力对合作社绩效有直接和间接的正向效应，而理事长的管理经验、财务信息公开次数、技术培训次数和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与合作社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较高的股权集中程度和较大的社员影响力反而对合作社绩效产生消极影响，而推广多样化品种对合作社绩效影响不大。外部交易环境对合作社绩效有间接的负面效应，外部社会资本和政府参与行为都对合作社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2. 启示

(1) 完善内部治理制度，促进组织功能实现。一方面，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分散，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对等的激励机制，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健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 增加组织的再生能力，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把握合作社在提高社员技术、推动农业绿色经济转型的作用，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绿色环保项目。同时，加强在农资选择和环境排放的源头管控，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3) 政府和合作社应该转变观念，重新思考补助实施和自我发展方式。从政府角度，政府支持应该更具针对性，合理分配有限资源，吸取先进经验，增强政策的正向影响和效率，以达到政府预期。就合作社而言，避免过分依赖国家扶持政策，提高领导水平，科学运用资源，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断完善自我决策管理，摆脱依赖政策支持和绩效不佳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黄祖辉,梁巧.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集体行动——以浙江省箬横西瓜合作社为例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09).
- [2]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2,(03).
- [3]徐旭初,吴彬.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 52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5).
- [4]Bijman, Jos and Ilipoulos, Constantine.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the EU: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Organization [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14, (04).
- [5]黄胜忠,林坚,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03).
- [6]王图展.农民合作社议价权、自生能力与成员经济绩效——基于 381 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6,(01).
- [7]刘洁,祁春节,陈新华.制度结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西省 7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6,(02).
- [8]孔祥智,郭艳芹.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状况、组织管理及政府作用——23 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调查报告[J].农业经济问题,2006,(01).
- [9]李道和,陈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分析——基于江西省调研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4,(12).
- [10]Lin, Justin, Yifu, Tan & Guofu.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05).
- [11]王图展.自生能力、外部支持与农民合作社服务功能[J].农业经济问题,2017,(05).
- [12]董晓波.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管团队集体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08).
- [13]Grashuis J, Ye S U.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armer Cooperatives: Performanc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Finance, And Member Attitude [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19, (90).
- [14]刘滨,陈池波,杜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实证分析——来自江西省 22 个样本合作社的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09,(02).
- [15]Valentinov V. Toward a social capital theory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J]. Journal of Cooperative Studies, 2004, (03).
- [16]徐志刚,张森,邓衡山.社会信任:组织产生、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来自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

验[J]. 中国软科学, 2011, (01).

[17] Benos T, Kalogeras N, Verhees F J H M et al. Cooperatives'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Strategic Attributes, and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Agribusiness Cooperatives in Greece[J]. Agribusiness, 2016, (01).

[18] Cadot, Julien. Agency cost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the case of family firms, investor-owned firms and cooperatives in the French wine industry[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 (02).

[19] 国鲁来.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支持分析[J]. 中国经贸导刊, 2006, (09).

注释:

1 杨久栋等: 2019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二)——基于农民合作社的调查和数据, 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9 年 2 月 23 日。